# 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

## ——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

程晓农



【注释】

在有关共产党国家政治演变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视为毛泽东独创的异想天开的政治试验。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谈到“文革”这一概念或政治运动本身时，往往不约而同地把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 10 年联系在一起。其实，“文化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而是他从苏联模仿来的政治舶来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早在 1928 年到 1931 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1949 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 1964 年到 1966 年 8 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 30 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 1966 年 8 月起，毛泽东将一场类似于苏联的“文化革命”转变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产生了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更为恶劣、广泛、深刻的后果。

1978 年，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编辑出版了一本《俄国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绍苏联的“文化革命”。1985 年，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派珀（Suzanne Pepper）在《中国季

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此书。[2] 派珀在书评中提到，费茨派垂克关于苏联“文化革命”的书本来应该引起西方国家许多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此书知之甚少。[3]

派 珀的书评发表至今已 20 余年。尽管中国的“文化革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从概念到方法有种种相似之处，但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还是苏联问题专家， 通常都只观察分析单一国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将中苏两国的“文化革命”纳入比较研究的范畴，因而研究者和读者都没有机会通过“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发 现单一国家“文革”研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Rodrick MacFarquhar）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三卷本专著[4]探讨“文化革命”的起源时，把“文革”解释为“百花齐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这一角度虽然将苏联因素引入了关于中国“文革”的研究，但麦克法夸并未把苏联的“文化 革命”纳入分析，自然也无法从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任何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比较研究，初步分析这两场“文化革命”的异同，从中提出一些供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一、苏联的“文化革命”：“文化专制”加“文化进步”**

20 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

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在知 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 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要创造 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侯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5] “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 化“无产阶级化”。1922 年到 1923 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 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6] 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1928 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 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 1958 年提出的类似口号），“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 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就 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

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的在文化领域的主 导地位。[7] 因此，苏联在 1928 年到 1931 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 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由 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声 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不 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出， 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8]；他强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9]

打 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哪 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历史背 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

大范围饥馑，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10]；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生 了一系列问题[11]。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消 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苏 联的“文化革命”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 1928 年的沙赫基审判和 1930 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师 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把 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人， 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重用 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12] 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13] 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 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在 苏联“文化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1920 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中 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14]

尽 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并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 化革命”结束了。1931 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

苏 联的“文化革命”将大量非共产党知识分子逐离岗位，以“马克思主义斗士”和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取而代之。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留 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1932 年 4 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和 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16] 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 11 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 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 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

“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18]

## 二、中苏两国“文化革命”的异同

1966 年夏，中国的官方媒体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对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仅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 1958 年正式宣布过“文化革命开始了”。[19] 据史而断，毛泽东 1966 年发动的“文革”其实是中共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 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中共的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1949 年中共建政前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计划”。[20] 建政之初，中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的“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例如，建立政权之后经过将 近 10 年的稳定期，就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为此需要强制型农业集体化，与此同时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中 共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时间与苏联稍有差异。凑巧的是，中共建政后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起始时间恰恰与苏联同 步，1958 年中共首次宣布“文化革命开始了”，正是执政将近 10 年之时。

1950 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中共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治需要而随 时变化。例如，1956 年 1 月 24 日，在知

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21] 按照这一说法，似乎“文化革命”就不是打击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了。几个月以后，刘少奇 1956 年 9 月 15 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则把 “文化革命”说成是“文化教育”的另一种表达：“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在 12 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22]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越来越深，对“文化革命”的提法也相应“革命化”了。在 1958 年 5 月 5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刘 少奇的说法是：“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 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3] 这一政策设想基本上是斯大林“文化革命”计划的翻版。

按 照中共的最初设计，“文化革命”是“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不甘于屈居“晚辈”赫鲁晓夫之下、急于争当共产主义阵营新领袖的毛泽东求功心切，不择 手段，结果他的“大跃进”比苏联的“大跃进”失败得更惨。于是，中共不得不选择休生养息之策，毛泽东也黯然退居“二线”，将烂摊子交给刘少奇等人收拾，中 国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然而，“文化革命”这个政治口号和政策设想却一直留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

1962 年，毛泽东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旗帜，试图夺回对政局的绝对控制权，他选择文化领域为突破口[24]，“文化革命”又卷土重来。按照 1964 年底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 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25] 在当时的官方话语[26]和一些文人的应景文章[27]中，这场“文化革命”有时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其政策含义与斯大林模式的“文化革命”并无二 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这种他们十分熟悉的“文化革命”不仅没有任何抵触，而且积极参与。刘少奇个人对毛泽东掩藏在 “文化革命”旗帜背后的真正用心察觉与否，其实无法阻止“文化革命”的发生。

需 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从 1966 年开始刻意换用他那套毛主义的“文革”话语，以区别于以往中共推行的斯大林式“文化革命”，其中最主要的话语就是为党内“大 清洗”制造舆论准备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继续革命”等“理论”。1969 年 4 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专门解释了“文 革”的“准备”过程。然而，此报告一字未提中共在 1966 年以前所主张的“文化革命”，仿佛那个“文化革命”从来就未存在过。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掩盖 了，从此以

讹传讹，人们普遍接收了官方的这一说法，仿佛 1966 年发动的“文革”还真是“史无前例”的。

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政策时，可以说是就事论事，达到目的便及时收兵。苏联的“文化革命”结束后，政局仅仅平静了几年，斯大林又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著名的“大清洗”。随着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送上审判台，全国有大批苏共中央委员、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秘密逮捕，送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就象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诗中所描绘的，人人都害怕秘密警察的黑色轿车停在自己住宅的楼下。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产生了斯大林时代的一个黑色政治幽默：一个人感到最轻松自在（在俄语中这个词也表示“幸福”）的时刻，是秘密警察来敲门抓人时，发现不是来逮捕自己，那就可以响亮地告诉秘密警察，“你们找错门了，那个人住在隔壁”。

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就是 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

苏 联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出独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原来是工人、农民，通过速成的专业教育就转行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干 部。其特点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与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世界事务缺乏兴趣，而专注于工艺技术方面的小发明，或热衷于落后省分 开发、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胆大妄为的计划。[28]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自从 1960 年代中共提出“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之后，教育部门对在校大学生和调干生的培养，产生了与苏联“文革”后新一代 “知识分子”特质相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当中的党、团干部又十分典型地集中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比如，在他们的个人知识积累当中，理工 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官方意识形态教条为主，缺乏人文素养，未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虽有大学学历却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鲜有认识， 政治上自觉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热衷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甘当“驯服工具”，没有独立思考的兴趣和能力。当“又红又专”的这一代按照年龄阶梯升入权 力高层之后，他们的人格缺陷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成了共产党技术官僚的中 坚，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一代”[29]。统治精英个性、能力上的趋同化，体现在治国方面就表现为“勃列日涅夫时代”僵化保守的政治特征。

以 上分析说明，对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政府而言，“文

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统治彻底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必然过程。就此而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绝非偶然，因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内生的、为全面达成极权主义控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当然，毛泽东对 1966 年的“文化革命”之种种操纵设计还有其个人政治动机。

**三、提升还是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中苏两党文化特质的体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远比苏联的“文化革命”恶劣，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之外，还与中共的文化特质有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中国传承者全盘继承了苏联“导师”们的政治遗产，但却抛弃了苏联“导师”们基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而维持不坠的那种对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尊重，这与中国传承者自己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

在共产党国家，执政党的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因为极权体制下执政党只允许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它宣称自己的成员“天然”地代表着“先进文化”，因此在贯彻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过程中，执政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支配整个社会文明的演变。由于执政党的集权性质和民众自下而上的盲从，其领导集团的文化素质又对社会的文明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苏两党建政时期领导集团文化素质的差异使得两国“文化革命”对社会的文明演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众所周知，俄共（布）的领导集团以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总体上对现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在推行“文化革命”政策的过程当中以及“文化革命”之后，苏联当局始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希望把工人农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尔乔亚”的文化层次上去。

在 苏联的“文化革命”年代，当局提倡的“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低层次的“文化”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如洗手时要用肥皂，要每天刷牙，不随地吐痰，扫除 文盲等。这主要是针对苏联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生活习惯提出来的，旨在消除社会生活中落后与不文明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层次是针对城镇居民而言 的，要求大家注意餐桌上的举止、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对女性的礼貌谦让，还要求大家掌握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知识；第三个层次是礼仪文化，它曾一度被称为 “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化，这包括要保持良好仪态、说话时用语优雅、穿着整洁适当，还要具备一些对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芭蕾舞等高雅文化的鉴赏能 力。总之，苏联当局希望企业管理阶层和新政治精英能达到礼仪文化所要求的水平。[30]

虽然苏联当局排斥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但它对科学本身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尊重。当局对苏联科学院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在“文化革命”和历次政治迫害当中，苏联科学院的制度从未受到冲击，科学院院士的精英和特权地位也一直受到保护。[31]

“你 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吗？”这是苏联“文化革命”后，即 1930 年代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场社会文明运动的主题。在此笔者抄录一份刊

登在 1936 年苏联媒体上 的“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 10 个问题”[32]，在当时苏联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团体配合共产党的“社会文明教育”宣传中，它很有代表性。

“有文化的人应能回答的十个问题”：

1. 能否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一首诗歌？

2. 能否说出出莎士比亚的 5 部剧作的名字和主要特点？

3. 能否列举非洲的 4 条河流的名称？

4. 能否说出你最喜欢的作曲家的名字以及他的 3 首代表性作品？

5. 能否列举 5 枚关于苏联汽车的邮票？

6. 能否不假思索地用小数报出分数 3/8 的数值？

7. 能否说出上一个赛季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以及它们的结果？

8. 能否介绍一下上个季度杰出艺术家拍摄的你最喜欢的照片中的 3 幅？

9. 您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吗？

10. 详细地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斯达汉诺夫运动”？

在这 10 个问题中，只有最后一个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其他问题都与

提升大众的文明程度有关。虽然苏联当局并不要求工人农民都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在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当中，“当一个有文化的人”却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当然，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尽 管苏联的极权体制延续了将近 70 年，苏联民众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脑教育中，但苏共文化政策的现代文明取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苏 联民众在培养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传统。从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看，苏联民众平均的文明素质并不低于自由民主国家国民的水准。这样的文明素质 与俄国政治转型的平稳性有很大的关系。

而 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共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其早年政治领袖当中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纷纷落马，自 1930 年代初期开 始，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内精英集团成员大多数未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多数领导集团成员长期生活在偏僻荒凉的山区，“占山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 现代文明处于隔离状态。在长期依靠低文化程度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夺取和掌握政权的过程中，中共习惯于打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抬高工农干部，形成了工农干部“老粗”高人一等的党内传统。这种局面自从“延安整风”之后愈发严重了。自中共“七大”开始，中共党内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则成了党内至高无上的 “君主”，毛泽东的个人文化素质因此对中共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多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表明，毛泽东长期以来有“反智”情结和“反文明”情结，其“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是观察他这两个情结的一个样本。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个人卫生习惯上仍然对文明持抗拒态度（如讨厌洗澡、刷牙），自然更谈不上对 稍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尊重了。毛泽东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让“大老粗”扬眉吐气的话指导国事，于是他领导下的中国就沿着反文明的方向行 进。

1950 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盘苏化”的方针，苏共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多少影响了中共领导集团的观念，那时苏联流行的文明习俗和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里深受欢 迎。许多 1950 年代的大中学校学生的外国文学和音乐修养基本上都来自“全盘苏化”时期苏联文化的熏陶。然而，随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彻底失败，他在 国际共运阵营里的威信遭到重创，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之梦从此破灭。面对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轻慢，恼羞成怒的毛泽东倾全力于中苏论战，著名的“九 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于此时问世。中共尊奉的佛教高僧赵朴初的逢迎之作“某公三哭”（又称“哭三尼”，指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 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经《人民日报》发表后，更是在坊间广泛流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成了妇孺皆知的口号，中苏两国关系从此恶化。在“反修防 修”的旗号下，苏联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进的苏共党文化均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

当 毛泽东 1966 年把“文化革命”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推向疯狂的颠峰时，中国在文化领域里实际上被引导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仅

反对西方的文明，也反对 苏联的文明；既反对外国的文化，也反对本国的文明传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同时又发展出了一 整套现代愚昧来替代文明与文化。正是在这种现代愚昧的支配下，“挥舞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充满了中国古代民间神巫文化色彩的祈祷赞神仪式，挟权力之威席卷 1960 年代的中国大地。

“文化革命”在苏联提升并保持了国民的文明程度，而在中国却降低并毁坏了国民的文明素质。“文革”之后人们批判这场政治运动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文革”的有形破坏上，却较少谈到“文革”的无形破坏。事实上，“文革”对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毁灭性打击，后果深远。

时 值“文革”40 周年，回溯这段历史及其影响，令人感慨颇深的是，今日中国国民的文明程度仍然难以追比当年苏联国民的文明水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西方的 现代文明里只选取了商品和技术，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然持排斥态度。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中国社会在疯狂追求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道德和伦理日渐 消亡。精英层文明程度的退化和道德堕落尤其触目惊心，物欲、肉欲、权欲成了许多精英的唯一追求，并且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

中 国反文明的“文化革命”和缺乏文明熏陶的“革命精英”所留下的这些重创，已经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沉重负担。由此来看，中国的不幸不仅在于无法拥抱苏联式的 文明建设，还在于中国式的“文革”不死。消灭文明不难，重建文明却实非易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背

离文明而走向现代化。如果要问“20 世纪后半期以来 中国是否进步了”这个问题，仅从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去评价，恐怕很难回答一个“是”。这是个有关文明兴衰的大题目，中苏两国“文革”的比较研究可以 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说，极权主义统治是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难以逃避的噩梦，那么中国的灾难比苏联要严重得多，中国特色的“暴力革命”和 “文化大革命”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将对 21 世纪中国的演变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文革”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涉及“文革”这一研究领域， 它同时属于共产党国家文明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对认识共产党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作者说明：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宋永毅先生提供了一些中国 的史料，特此致谢。

【注释】

[1]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2] China Quarterly, No.103 (Sept., 1985), pp.534-537.
[3] Ibid., p.534.
[4] Rod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5] David L. Hoffman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oviet Modernity, 1917-1941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8.
[6] Ibid, p.39.

[7] 出处同注[1]，第 8-40 页。

[8]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45 年出版），第 354 页。

[9] 出处同上，第 369 页。

[10] 参见高王凌的“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 年第 1 期。

[11] David R. Shearer. Industry, State, and Society in Stalin's Russia, 1926-193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出处同注[1]。

[13]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18.

[14] 出处同注[1]。

[15] 出处同注[5]，第 40 页。

[16] Catrioa Kelly and David Shepherd. Russia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3.

[17] 出处同注[8]，第 484 页。

[18] 出处同注[13]，第 17 页。

[19] “文化革命开始了”，《人民日报》社论，1958 年 6 月 9 日。

[20] 新华社 1949 年 4 月 11 日报导，“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计划，青年团员是积极参加者，卡夫坦诺夫赞扬共青团学术成就”。

[21] “中共党史上的 80 句口号：‘文化革命’、‘技术革命’”（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7.html）。

[22] 新华社 1956 年 9 月 17 日报导。

[23] 刘少奇，“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 年 5 月 5 日），新华社 1958 年 5 月 27 日报导。

[24] 新华社报导，“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闭幕，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式”，1964 年 8 月 1 日。

[25] 新华社报导，“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1964 年 12 月 31 日。

[26] 例如，在新华社 1964 年 11 月 27 日关于“陆定一副总理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讲话，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是最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导中，“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混用的，两者并无区别。

[27] 曹禺，“文化大革命万岁”，载 1964 年 10 月 17 日《人民日报》。

[28] Chris Ward, ed. The Stalinist Dictatorship. London: Arnold. P.112.

[29] 出处同注[13]，第 6 页。

[30] 出处同注[13]，第 80 页。

[31] 出处同注[13]，第 108 页。

[32] 原载莫斯科的 Ogonyok（《精神》）杂志，1936 年第 1 期第 22 页，引自沃尔科夫的文章“文化的概念，1935 年到 1938 年：苏维埃的文明化和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V.V. Volkov, "Kontseptsia kulturnostsy, 1935-1938 godei: Sovietskaya tsivilizatsia i pofcegnefnostsi Stalinskovo vremenyi (Conception of Cultureness, The Years from 1935-1938: Soviet Civiliz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Stalin's Time." Moscow: Sotsiologicheskyi dzrurnal (Sociological Journal), 1996, No.1-2, pp.194-213。V.V. Volkov 是俄国圣彼得堡市欧洲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教师。